

杭高的三位语文老师

叶元凯

我 1949 年秋考入杭州高级中学。杭高是江南名校,鲁迅、李叔同、朱自清、叶圣陶等一大批名师都曾在此教学,郁达夫、徐志摩、丰子恺、都是从这里毕业的学子。我在杭高就学 3 年,得到多位老师的教诲,我今年已是耄耋之年,但师恩在心难忘。

宋清如老师是我高一的语文老师,她也是我们的班主任。我们听说,清如师和她的丈夫朱生豪先生都是 30 年代之江大学的学生,那时他们相识相爱,郎才女貌,传为佳话。朱先生 1936 年开始翻译莎士比亚戏剧。1942 年他们结婚,清如师协助朱先生工作。但在战乱中译稿几次被毁,几次重译。

朱先生在极端困难的生活条件下,坚持翻译,先后译出莎剧 31 种,是国内翻译莎士比亚作品较早和最多的一人。他的译文质量和风格卓具特色,为国内外莎士比亚研究者所公认。

在战乱的条件下,他们俩生活极为艰难,朱先生积劳成疾,不幸在 1944 年底去世,时年 32 岁,他们的孩子当时才 1 周岁。他的书稿 1947 年秋由上海世界书局分三卷(喜剧、悲剧、杂剧)出版,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朱译的《莎士比亚全集》。1950 年,我们在清如师的房间里看到,案头放着厚厚的世界书局的三卷本,上面盖着洁白的手绢,我们明白,她心中时刻怀念着逝去的亲人。

她那时还带着她和朱先生的后代,一个 6、7 岁的男孩,所



以,工作和生活负担不轻。清如师对我们的作文批改很着力。她的字体娟秀,评语中肯,显出她的国学功底。我母亲曾去学校找清如师谈家庭情况。母亲回忆,她和清如师年龄不相上下,都是带着孩子寡居。两人还很谈得来。母亲说清如师是个能体谅人的好老师,为她中年丧夫感到惋惜。

我高三结束后,曾留校担任学生辅导员,我见到清如师时,向她介绍我的新情况,她叮嘱我一面工作,一面还要努力学习,不断提高。醇醇教导,令我感动。90 年代,我在国内的“人物”杂志上读到清如师的生平事迹,那时她已回到故里嘉兴市。嘉兴兴建了朱生豪的纪念馆,清如师将朱先生的 31 部莎士比亚戏剧翻译手稿和人民出版社颁发的《莎士比亚全集》的稿费都捐献给嘉兴市人民政府。1997 年,清如师以 86 岁高龄去世。

我高二时的语文老师是董秋芳先生。董老师穿长袍、布鞋,面容清瘦,说话带绍兴口音。当时他已经 50 过了,同学们传闻,他 20 年代在北大读书,和鲁迅先生过从很密。董先生自己在课堂上可从来没有给我们讲他过去的事。我们到图书馆里借到他 20 年代末由北新书局出版的翻译作品集《争自由的波浪及其他》,书前有鲁迅先生写的《小引》,介绍这本书。书中收集了董先生翻译的契诃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等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我们读了才知道董老师早在 20 年代就译出这些倡导社会民主的作品。

当时杭高图书馆新购影印本的“鲁迅日记”,全是鲁迅先生毛笔书写的,就放在阅览室里让大家浏览。我们发现,其中有几十处记录先生和董秋芳来往的情况。后来学校里开展课外活动,其中一项是整理图书馆的存书。我因为喜欢看书就报名参加这项活动。我们这个小组恰好是由董老师指导的。他召集我们开会,说明整理图书的意义和方法,带我们进书库参观。杭高有百年历史,藏书很丰富。我看到“浙江潮”一捆捆地排列在墙边,上面落满灰尘。我们在近代史课本读到过介绍这本杂志的内容,它是清末浙江留日的志士们创办的,章太炎、蒋百里、鲁迅等先贤常在上面发表鼓吹革命的文章,因而我们更感到整理藏书的重要性。后来我们听说,董先生抗战时担任过福建省图



董秋芳先生

书馆的馆长,当然是个内行人。

我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外语老师,1957 年我看见学生的高中语文课本有语文和文学两本书,文学课本系统编排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我也很爱读。我注意到编者是叶圣陶、张毕来等大家,董老师的名字也在其中。我又惊讶,又高兴。

90 年代,我读到了季羡林大师的回忆文章《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董老师是他 1929 年济南省立高中的语文老师。季文称,董老师是他“平生感激最深,敬意最大的老师”。我深感欣慰,董老师也曾教过我。

到了高三,我们的语文课改由许钦文老师担任。他的孩子许品庚也和我们同班。许老师那时也是五十来岁,说的绍兴官话,语速较慢,穿戴普普通通,一点没有老作家的派头。品庚更是土里土气。同学们听说许老师早年 and 鲁迅先生来往很多,都感到惊讶,感到有这样一位名师来教我们的确非常荣幸。大家听说许老师有部早期作品名叫《鼻涕阿二》,听起来很好玩,就把品庚叫成“鼻涕阿二”,他听了也是笑嘻嘻的。许老师对我们的作文批改详细,我至今还保留着一篇他写了一大段评语的作文,这已是 62 年前的事了。后来我到绍兴鲁迅故居参观,看见橱柜里陈列着许老师 20 年代写给鲁迅的一些信件,他们讨论作品中的某个问题,我看了倍感崇敬。1955 年我大学毕业分派到陕北偏僻小县米脂当教师,我在县城唯一的小小的新华书店里看到许老师几种分析鲁迅作品的书籍,如《呐喊》分析、《彷徨》分析等,感到非常高兴,赶紧买下来仔细阅读,仿佛再一次聆听许老师的教诲。2010 年我路过杭州,杭高老同学又见了面,品庚也来了。他还兴致勃勃地说要来陕西上华山。我们一起回忆起杭高的老师,心中满怀感激和思念之情。同学们谈到许老师 50 年代后期担任了浙江省文化局、文联的领导工作,还是省政协的常委,但是他不改本色,仍是一身布衣来去,并且抓紧时间进行鲁迅研究,写出了不少力作。

三位老师已经先后过世了,我今年也已八十又一,想起老师,犹满怀着思念之情。

作者地址:
535 Thornview
P1 Waterloo
ON Canada N2T 2V9



许钦文先生

走向黎明（一）

叶世英

编者按:叶世英校友 1947 年考入杭高,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很快被杭高地下党关注、培养,1948 年秋先被吸收为 YF 成员,后加入中共杭高地下党,对周围同学的进步影响颇大。正当他全心身地投入革命,在组织分配的岗位上,努力工作时,却被众所周知的原因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1962 年被遣返回原籍劳动生产。叶世英同志虽受到了那么大的委屈,但仍能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胸怀,坦然处之。《走向黎明》是《回忆杭高》系列文章,本期刊登第一部分。

黑夜就要过去,黎明即将到来!

1949 年 1 月 1 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主席撰写的元旦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像一声春雷,响彻神州大地。正在杭州,面对白色恐怖,坚持地下斗争的我们,心情格外激动。

根据中共杭州(地下)市委的指示,杭市的地下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过去大呼隆式的群众运动(如罢工罢课等)转向积蓄力量,隐蔽精干,团结群众,护厂护校,防止破坏(南迁),迎接解放的斗争。

当时,我所在的浙江省立杭高,地下党的力量是相当强的。据我记忆,到杭州解放时止,杭高共有地下党员 16 人,另有 5 人已毕业离校。外围组织 YF,相当于后来的共青团员 24 人,绝大多数同志日后都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如王维澄,曾任杭高地下党支部书记,浙江省委秘书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现在京离休。项秀文,在王维澄毕业后继任杭高地下党支部书记,曾任杭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杭市政协副主席,已故。许行贯,曾任浙江省政府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离休。关志豪,曾任《中国青年》杂志社和《法制日报》社社长兼总编,已故。孙霆,曾任杭高地下党支部委员,《杭州日报》党委书记兼总编,杭州师大教授,编审,离休。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开展了一系列扎实有效的工作。

首先成立了杭高团结委员会(原称应变委员会,因国民党也搞了个应变会,为避免鱼目混珠,改名为团结委员会),利用这个公开合法的群众性组织,统一领导全校师生员工,投入护校斗争。团结委员会以学生自治会为主,吸收教职员工代表参加,主席和主要部门的负责人均为地下党员或 YF,分工负责宣传舆论,总务后勤,纠察保卫等工作。我们抓的第一件事就是配合学校总务处,将师生员工一学期内所需的粮油盐煤等生活必需品陆续全部运到校内,大大安定了民心。其次是成立了纠察大队和消防队,救护队(以女生为主),将学校军训用的长短军棍和步枪等交给纠察大队掌管,组织各班思想进步,身材高大同学轮流值班巡逻,以防万一。

我和另一地下党员朱人风(解放后曾任浙江省委教卫部教育处长,省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已故)原为学生自治会学术股长,此时兼任团结委员会文化部部长,继续负责宣传舆论工作。主要抓手有三:民主墙,学生图书馆和《杭高生活》。



杭高学生党支部大会会场

骆憬甫校友自传《浮生手记》介绍

《浮生手记 (1886——1954)》(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10 月版)不仅是江南骆氏的一部坎坷家史,一部以家族史的方式呈现出的中国近代史,更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抗战烽火中,如何保存元气以图复国后有所贡献的生存史和奋斗史。

《浮生手记(1886——1954)》是骆憬甫先生所著回忆录。作为我国第一代新式师范学校(浙江两级师范,骆憬甫 1911 年以史地科第五名毕业)的毕业生,他在浙江长期从事小学、中学的教育工作。日寇侵华战争之前,他执教于杭州,担任过十七余年的小学校长,在杭州基础教育界颇有声名。杭州沦陷以后,他不愿做亡国奴,遂领全家大小人众辗转流亡于浙南、皖南、浙西一带的非日寇占领区,继续执教,并先后支持儿女从事抗日宣传文化活动,投身于中华民族解放斗争。

作为一个具有良师、贤人、君子风范的平民知识分子,更作为一个爱家、爱国、爱民族的开明士绅,骆先生用自己的笔墨,先后著有《我的一生》、《流亡》、《浮生杂忆》、《国难吟》等自述生平的文獻,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真切翔实的二十世纪上叶的人生经历记。其中在抗战八年中,有关他自己和家人颠沛流离的生活实录和国破家亡的见闻感悟,尤其具有震动人心的力量。

《浮生手记》以《我的一生》为“上篇”,共分六章,依次由幼年、童年、青年、壮年、老年时期组成,凡 108 题;以《流亡》为“下篇”,不分章,凡 43 题。附录有《骆氏家谱》和《骆憬甫嫡系表》,以及其六女、八女和长孙的三篇回忆文章。

在六十八岁时,骆憬甫先生为《我的一生》所写的题记里曾经十分谦抑地说:“我写的一生,其目的并不是写我,而是借了我,写出我所处的时代背景。我生长在封建社会里,我出身在封建地主家庭中,环境害了我,使我成了一个无能之人,虚生了一世,对国家、对社会一无建树。让别人来写我,就是写一个字,也是多余的,现在我自己来写,把六十多年来的生活,从我的一生的具体事实反映出来,想来不是没意义的吧。这样我就陆续地写了。”

其实,由于作者超人的强记和细致的史笔,因此篇章之间为我们留下了十分丰富的见闻。

读憬甫先生文章,不能不佩服他的博学强记。透过他细腻的描述,将一部中国近代史以家族史的方式呈现,而其中的有记事,有言情,有写景,真是“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尤其对清末科举贡院的描写,大到典章制度,小到物品陈设,乃至青衣号军的嘴脸、贡院门口的对联,都巨细靡遗地记录,足以补正史文献记载之不足。

憬甫先生又逢中国历史最动荡的时期,满清政府既输了中日的甲午之战,又订了与八国联军的辛丑和约,保守陈旧的力量与维新的理想拔河,新式的学堂与老式的科举并行,而憬甫先生能由旧制入新制,继而参加学校的革新运动,再以他的新观念注入教育工作,任校长近二十年,其间社会的变迁,大家族的纠葛与亲人的聚散,更使这本自传拉大舞台的宽度,且呈现史诗的力量。

下篇《流亡》,作者生前曾经多次修改整理,“没有夸大,没有虚构,是劫后余生的一点纪念物”,他期待这包含着流亡人的血和泪的文字,能够作为“抗战史上的一种民间文献”传世。由于作者有意为流亡史见证的史家精神,因此他在抗战一开始,就留心逐日记载每天发生的事和人事活动,而且他的记载,常常在笔端饱蘸着浓烈的感情色彩。如



其篇首分析中日之战这一场“空前国难”的动因,“倾国之战”的两难,以及被迫和西湖、上海“话了别”的悲愤,都显示出作者无比鲜明的立场。他写道,在那年月:

谁都知道中国和日本必将有一场大战,但谁也不知道这场大战将在哪年哪月哪日开幕……自从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以来,“不抵抗主义”就被人唾骂、痛恨,抗战的决心,早已隐伏在四亿五千万人的脑际,只要有猛烈的导火线一引,这战火就可以漫天匝地的爆发起来。到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7 月 7 日,中国军队实在忍无可忍了,轰隆一声,开炮抵抗,于是中日大战揭开序幕。

“小乱避于城,大乱避于乡”,这是炎黄子孙世代相传的逃难经验。然而,当保家卫国之战在中华本土家园中揭幕,就意味着全民抗敌行动的展开。可是积弱大国初不能抵御暴发强寇处心积虑的战火冲击波,于是平民百姓的大流亡也就揭开了序幕。而骆先生纤笔细墨的《流亡》,正是一个大家庭的家长在抗战流亡中,经历千辛万苦不做亡国之奴的难得实录。其艰难困厄,如今由其一个个小标题尚可感知到:“开始大流亡 -- 别了老家”、“永别吾庐百感生”、“骨肉离散之序幕”、“杭县沦陷了 -- 没有了老家”、“大流亡的第二幕 -- 出亡横滨”、“骨肉离散之第二幕”、“大流亡的第三幕 -- 盛筵散了”、“大流亡的第四幕 -- 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二次流亡道上”、“险些儿第三次大流亡”……由此遥想当年今天过了不知明日如何过的流亡生涯,真是危然动容。

本刊将择憬甫先生在贡院参加科举考试、在杭高两级师范读书时期的部分进行选刊,让广大杭高了解曾经发生在杭高(贡院)这块土地上的故事。